

析論抗日戰爭後 東北抗聯史研究的特徵與走向

• 郝江東

摘要：東北抗聯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蘇聯、朝鮮共產黨人複雜互動的重要體現，對戰後中、蘇、朝三國關係的緣起及變遷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旨在梳理抗日戰爭結束後東北抗聯史研究的五個階段及其特徵。當前的相關研究主要由中國大陸學界推動展開，與中共中央的關注密切相關。不過，現有著述很多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意識形態指導下歷史敘事的「整齊劃一」是導致這種研究現狀的重要原因。新世紀以來，一方面，由於中共中央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東北抗聯史研究再度勃興；另一方面，隨着俄國檔案的解密與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興起，東北抗聯史開始受到來自冷戰國際史、中朝關係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為黨研機構主導的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而相關探討也隨之呈現全新的面貌。

關鍵詞：東北抗聯史 東北抗聯教導旅 中共黨史 金日成 中蘇朝關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東北抗戰拉開帷幕。及至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隊，聯合當時活躍在東北戰場的抗日義勇軍、抗日山林隊等，組編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東北抗聯」），一度達到三萬人的規模。1938年後，東北抗聯的鬥爭環境日益嚴峻，1940年前後陸續退入蘇聯整編、整訓。1942年8月，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遠東野營正式成立，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主要為蘇聯遠東內務與軍事機構從事情報偵察工作。1945年9月，遠東蘇軍總部將東北抗聯教導旅部分官兵分別送回中國東北與朝鮮蘇佔區，協助當地蘇軍維持秩序。以周保中為首的中國官兵進駐了中國東北五十餘個戰略要地，迅速與中共中央派到東北的部隊建立聯繫，投入東北解放大業。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則由金日成率領進駐朝鮮蘇佔區，在蘇軍幫助下建黨、建政、建軍，最終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0月，遠東蘇軍總部正式下令解散東北抗聯教導旅^①。

大致以1940年為界，東北抗聯史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相對前期歷史，東北抗聯後期歷史更具特殊性：第一，從中共黨史的視角來說，東北抗聯在1938年即脫離中共中央的領導，在聯共（布）黨的領導下工作，這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第二，1940年前後相繼退入蘇聯後，東北抗聯以獨立旅的形式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由蘇軍設置編制序列、指揮系統與後勤補給體系，為蘇聯從事情報偵察工作，在一定意義上已屬蘇軍「特種部隊」；第三，以金日成為代表的東北抗聯朝鮮官兵成為1948年成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集體。正是在蘇聯野營整訓期間，金日成逐漸確立了自己在東北抗聯朝鮮官兵中的核心地位，並成為莫斯科選定的「意中人」。正是鑒於這支部隊歷史的特殊性，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幹部的任用始終比較謹慎，對東北抗聯歷史的「功過是非」長期沒有作出正式結論。

目前，東北抗聯史研究主要由中國大陸學術界推動展開，與中共中央的關注密切相關。東北抗聯史作為研究對象受到關注，始於1945年9月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恢復關係，但由於這段歷史的特殊性以及中共中央沒有作出正式結論，相關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甚至一度成為研究禁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益於中共黨史研究的整體繁榮^②，東北抗聯史研究一度勃興，產出了一大批史料彙編與研究專著。正是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官方主持編纂了第一部相對完整的東北抗聯鬥爭史。嚴格來說，這一時期大部分研究並非嚴謹的史學研究，而是價值立場先行、夾雜着想像與感情色彩、結論「整齊劃一」的黨史類作品。截至當前，得益於研究環境的改善、中俄檔案的解密開放以及新的觀察與分析視角的應用，東北抗聯史開始受到來自冷戰國際史、中朝關係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相關研究隨之呈現全新的面貌^③。本文擬梳理1946年至今東北抗聯史研究的基本脈絡，將其分為五個階段，分別闡述各個階段的研究特徵。

一 第一階段（1946至1949年）：以宣傳和甄選東北抗聯幹部為目的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東北抗聯史引起中共中央與中國社會關注，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第一，中共中央與東北局有意利用「抗聯旗幟」，爭奪對中國東北問題的話語權與在東北地區歷史延續的「正統性」；第二，東北局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有甄選原東北黨與東北抗聯幹部的需要。

1945年9月下旬，東北局負責人彭真、陳雲在瀋陽會見了東北抗聯領導人周保中、馮仲雲、崔庸健等，標誌着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正式恢復關係。自1938年東北抗聯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至此已經有七年之久。根據陳雲的指示，周保中指令那些隨蘇軍進駐中國東北各地的東北抗聯官兵，「利用有蘇軍身份的便利條件，控制鐵路沿線，迎接黨中央派往東北的大批幹部的到來」，並在「已經控制的城市進行建黨、建軍、建政工作」^④。整體上看，這一時期

東北抗聯官兵出色地完成了東北局交代的各項任務，不僅積極利用擁有蘇軍身份的便利肅清各地日偽殘餘，擴軍、建軍、建黨、建政，迎接中共中央部隊迅速進駐，還成為東北局與駐東北蘇軍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與紐帶，幫助雙方就當時彼此關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實現了直接溝通，並開展了密切、充分的戰略協調。

1946年初，由於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調處國共矛盾取得進展，中國政局一度出現和平前景，東北問題也出現以「和平的政治的方法解決」的可能性^⑤。鑒於當時東北民眾中間普遍存在對國民黨政府的「正統」觀念，中共中央決定借助「抗聯旗幟」爭奪在東北的歷史合法地位，爭取全國與東北民眾的同情與支持，鞏固東北根據地^⑥。這一時期，東北抗聯在中國東北抗戰的歷史被宣傳為「一部千古不滅的英勇史詩」，「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東北人民的無上光榮，也是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無上共榮」^⑦。中共中央還以東北抗聯艱苦抗戰的歷史作為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的籌碼，指責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共產黨領導東北義勇軍獨立堅持十四年抗戰的艱苦光榮歷史，不承認東北問題和平談判與政治解決，仍繼續採取武力進攻」^⑧。為擴大影響，中共中央還指示周保中、馮仲雲等東北抗聯主要將領公開發表文章或接受訪談，宣傳中共領導東北抗戰的歷史^⑨，並向國民黨政府聲明東北抗聯「最有資格、最有權利代表國家、代表國民政府接收該地區政權」^⑩。

1946年中，政治形勢開始發生劇烈變化。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軍事勝利成為國共雙方決勝東北的根本，東北抗聯歷史的宣傳價值隨即大幅下降。7月7日，東北局在哈爾濱舉行擴大會議(史稱「七七會議」)，做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決議。為此，東北局開始着重培養東北本地幹部，決定集中整訓原東北黨與東北抗聯幹部^⑪。在此過程中，鑒於這批幹部暴露出較多歷史問題，東北局決定對他們開展「延安式」整風，最終審查清理了一批歷史問題嚴重的幹部^⑫。1948年1月1日，東北局發出經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前東北地下黨組織之黨員與抗聯幹部的決定〉，在肯定東北抗聯幹部參與抗戰的同時，着重指出了他們的各種問題^⑬。1949年5月，毛澤東在京聽取周保中匯報後致電東北局與中原局，指出「抗聯幹部領導抗聯鬥爭及近年參加東北的鬥爭是光榮的。此種光榮鬥爭歷史應當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但抗聯同志在過去的工作中亦和黨內其他從事革命鬥爭的同志一樣，是難免有缺點和錯誤的，應該着重檢討自己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⑭。

應當指出，當時面對更為緊迫的國共內戰與建國問題，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東北局，都沒有精力也沒有意願去系統了解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複雜歷史，因而既沒有對東北抗聯歷史作出整體性評價，也沒有解決東北抗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各種爭議問題(如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王明、康生名義給東北關於如何開展抗日游擊運動的指示信等)。即便如此，1946年前後有關東北抗聯歷史的宣傳話語還是對後來的東北抗聯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上述1948年初發布的東北局的〈決定〉與1949年5月毛澤東發出的電報，經常被後來的研究者或宣傳機構斷章取用，其中那些對原東北黨和東北抗聯幹部開展抗日游擊運動的肯定性表述，通常被用來作為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歷史的

正式結論使用^⑮。事實上，中共中央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對東北抗聯史作出結論，要到四十年後的1986年（下詳）。

二 第二階段（1953至1955年）：未完成的編史工作

建國之後，中共中央為系統總結解放軍的歷史經驗，指示各部隊着手編史工作。1953年，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召開戰史編纂工作會議，確定由東北軍區負責編纂東北抗聯鬥爭史。東北軍區司令部為此積極抽調幹部着手工作，可最終發現，無論是資料搜集還是編史工作都舉步維艱、難以推進。

史料搜集方面，東北軍區司令部發現，「材料的來源是極端缺乏的」：一方面，大部分相關史料確認已經「自行銷毀、掩埋或失散，現存原始文件極少」；另一方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與朝鮮勞動黨中央、原東北局已經進行過一輪搜集工作，「有價值材料已被搜集殆盡；就是一般性質的材料亦被收集去了」。鑒於這種情況，1954年，東北軍區司令部經總參批准，邀請原東北抗聯領導人馮仲雲、王效明到瀋陽協助工作，由他們出面向原東北局組織部借出《東北地下黨及抗聯問題的參考資料》（共十四集，約280萬字）作參考之用。此外，東北軍區司令部還組織一批原東北抗聯幹部撰寫回憶錄，並收集負責同志的報告、書信、日記，摘錄各類東北抗聯文章等^⑯。

編史工作方面，儘管東北軍區司令部搜集的史料已有一定數量，但仍不能滿足編史需要，原因是：第一，大多史料取自日偽文件，經過多次翻譯已難辨真偽，甚至那些從原東北局組織部借出的史料，也因當時工作粗糙的緣故，存在「盲目採用」、「過早下結論，草率從事」等問題；第二，回憶性史料價值不高，參與撰寫回憶錄的多是原東北抗聯中下級官兵，回憶錄「內容零碎、缺乏系統，都是對一般瑣碎事實的記載，缺少分析批判，涉及到政策路線、建軍原則問題的少，參考價值不大」，並且「在對東北抗聯的估計、勝敗論定、建軍原則、統一戰線、農民問題、根據地建設、部隊人數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存有分歧」；第三，編史工作人員大多不了解東北抗聯歷史的複雜性，而且普遍缺乏歷史知識，「難辨別材料的主次、輕重、是非」；第四，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歷史沒有作出明確結論，導致編史工作人員不僅無從甄別與取捨史料，對原則性問題也無法論定^⑰。

鑒於以上考慮，東北軍區司令部斷定編史工作根本無法完成，認為若要推動這項工作取得進展，首先需要在「抗聯幹部中統一思想」，並需要「中央對東北黨及抗聯的歷史作了結論」^⑱。1955年3月，東北軍區交出的最終成果，只是在原東北局組織部提供的《東北地下黨及抗聯問題的參考資料》以及一批老戰士回憶錄的基礎上，編纂出的一套九卷本《東北抗日聯軍歷史資料》。這套叢書的「說明」特別指出，「根據我們在一年半工作中的初步體會，認識到編史是一項特別艱巨而又細緻的工作。而且抗聯歷史又非常複雜。做好這一工作，必須有充分的史料，長期的時間，足夠的稱職幹部，特別是須有抗聯的主要幹部參加編寫，方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並強調已完成的工作主要是「為以後編纂鬥爭史準備條件」^⑲。可見這一階段的編史工作沒有太大進展，僅出版了一套東北抗聯史料叢書。

三 第三階段（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 處理對朝關係需要

19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朝鮮成為雙方爭奪的盟友。出於對朝關係的考慮，以及在政治上支持朝鮮國內與黨內的「主體」(Juche)宣傳，中共中央指示「重修」東北抗聯史。

如前所述，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問題有着複雜的歷史背景。1920年代後期，鑒於朝鮮共產黨內部派系鬥爭嚴重，共產國際曾指示取消朝共組織與本土共產黨，本土朝共黨員改由日共領導，在中國東北的朝共黨員則統歸中共領導，經審查後可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共^②。此後，大批朝共黨員加入中共，接受中共領導，在中國東北從事抗日鬥爭。雖然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指示中共東北黨在組織、軍隊上突出朝鮮同志的獨立性，以便更廣泛地宣傳與動員朝鮮抗日運動，但這一政策由於不具備現實可行性，最終淪為「政治宣傳口號」^③。1937年前後，朝鮮官兵主要集中在東北抗聯第二軍。1940年前後，東北抗聯朝鮮官兵越境蘇聯後，主要被安置在位於烏蘇里斯克附近的南野營。1942年東北抗聯教導旅成立後，以南野營官兵為基礎，組建了金日成擔任營長的教導旅第一營^④。

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問題的敏感性還在於，在1948年9月組建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以金日成為首、於1945年9月從蘇聯回國的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後來絕大多數成為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或高級幹部^⑤。此後，為了在朝鮮國內與黨內塑造金日成的「主體」地位，朝鮮當局將這批官兵參加東北抗聯的經歷，描述成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在國外反對朝鮮國內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鬥爭歷史，並否認他們曾經加入中共的事實，如此就割裂了中國東北抗戰的統一性^⑥。其他問題還包括：第一，東北抗聯朝鮮官兵究竟是中國朝鮮族人還是在華朝鮮僑民，從未有過清楚界定；第二，無論在東北抗戰時期，還是在蘇聯野營整訓期間，金日成都不是東北抗聯中級別最高、表現最突出的朝鮮幹部，至少截至1945年初，他仍非莫斯科選定的「意中人」；第三，東北抗聯的朝鮮幹部大多是中共黨員，在中共東北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抗日鬥爭^⑦。

新中國關於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問題的公開表態，最早可見於1950年9月。9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公開聲明，「不僅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如此，即在中國革命的前三個階段——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時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時期，都曾居有居留中國境內的朝鮮人民參加這些革命戰爭的事實。朝鮮人民犧牲他們的生命，流了他們的鮮血，站在中國人民一起，為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勢力而鬥爭」^⑧。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刊文，「十幾年來，朝鮮革命志士的鮮血灑遍了中國的土地。偉大的中朝兩大民族，在歷史的考煉中，已經結成了牢不可破的戰鬥的友情」^⑨。12月6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正式結成了東北抗日民主聯軍，它的主要領導者就是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金日成等中朝人民的抗日英雄」^⑩。《人民日報》發表這些宣傳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為抗美援朝作動員，並未特別突出金日成在東北抗聯時期的領袖地位^⑪。

1956年前後，隨着中蘇分歧逐漸加深以及中國外部安全形勢日益嚴峻，中國領導人開始頻頻向朝鮮當局示好，希望與蘇聯爭奪朝鮮這一盟友^⑳。為了博得朝鮮當局的好感，中國政府在許多方面作出重大讓步，甚至「割讓」了半座長白山與天池^㉑。正是仗着游刃於中蘇之間的靈活性，金日成自1956年開始在國內和黨內大搞整風、鎮反、清洗運動，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力和地位。朝鮮國內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逐漸形成並迅速加強，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塑造金日成在抗日戰爭中的光輝形象與領袖地位。正是這一時期，朝鮮國內有關金日成領導抗日的各種出版物與宣傳資料急劇增多。1958年2月8日，金日成在紀念朝鮮人民軍建軍十周年大會上發表〈朝鮮人民軍是抗日武裝鬥爭的繼承者〉演講，首次將他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稱為朝鮮人民軍的唯一前身^㉒。

為爭取朝鮮成為中國的盟友，中共中央在歷史問題上積極配合朝鮮當局的「主體」宣傳。1962年，彭真在訪問朝鮮期間的公開演講中，就提到「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共產黨人所發動的抗日游擊戰爭」^㉓。1963年，周恩來告訪訪華的時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曾擔任東北抗聯教導旅中共東北黨委會書記的崔庸健，「對東北的抗日聯軍應有新的認識，抗日聯軍實際上是中朝人民的聯合軍」^㉔。他指示東北三省把「這段歷史重新寫過來」，將金日成領導的抗聯部隊視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東北和朝鮮搜集東北抗聯朝鮮幹部史料，並「按聯合鬥爭的精神整理材料」，以充實東北各地抗戰紀念館。東北三省根據這一指示積極部署，搜集並編印了數千份東北抗聯文獻、數百篇訪問錄與大量日偽資料，同時修建紀念碑、烈士館，並編史、編劇本、拍電影，積極宣傳朝鮮人對東北抗戰的貢獻，特別突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東北抗聯部隊中的領袖地位^㉕。

周恩來要求「重修」東北抗聯史的指示，以及東北三省的宣傳與工作部署，是對朝鮮以金日成為核心的「主體」宣傳的重大配合。然而，這一指示因並不「符合歷史真實性」，對東北黨史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造成了相當的混亂，這種混亂首先體現在與朝鮮接壤的延邊地區。1963年，延邊中共地委專門開會討論如何針對周恩來的指示作宣傳與工作部署。與會代表紛紛提出問題，諸如如何解釋周恩來所說的「中朝聯合軍」以及「怎麼樣聯合的」？「當時的抗日無疑是在中共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但是總理說的是中朝兩國人民的聯合部隊，那麼黨的領導怎麼解釋？」「歷史傾向性問題，從政治上要支持朝鮮勞動黨。這樣是否與歷史真實性相矛盾呢？」「抗聯第二軍究竟怎麼解釋？黨的領導如何體現？根據地、戰役、會議等如何解釋」，等等^㉖。

這一混亂情況在當時原東北黨與東北抗聯官兵以及知情人士較多的黑龍江省尤為突出。黑龍江省自省委以下的各級部門為此作了大量的解釋與說服工作，確定由時任省長李范五、副省長陳雷專門負責東北抗聯歷史問題的工作。1963年6月20日，李范五向黑龍江省有關部門講話時明確指出，「現在人家〔朝鮮〕要確立自己的歷史，樹立領導核心，比較合適的說法是朝鮮共產主義者，何必再死扣是中國人，中共黨員呢？這是大國主義」，他呼籲要將東北抗聯的宣傳口徑與朝鮮對接起來，要求在這一問題上「不要死別這個勁了，要在政治上支持金日成」^㉗。次日，陳雷在省委黨史研究所講話時也強調，周恩來的指示「是在於支持一個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而不是一個附屬品。不這樣

認識，就是大國沙文主義。一個國家的黨要教育後代，要有自己的歷史」，這一指示「確立了朝鮮黨的歷史基礎，解決了抗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這是對朝鮮黨政治上的重大支持，是國際主義精神的體現」^⑳。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東北抗聯史的研究與宣教工作一改此前「主要講國內統一戰線的一面，不太強調中朝兩國人民聯合的方面」，確立了延續至今的有關「東北抗聯的主力是中朝人民的聯合部隊」的基調。經東北三省省委全方位貫徹，東北地區絕大多數歷史紀念館、烈士館、陳列館、紀念碑以及宣傳文件，統統抹去了那些返回朝鮮的東北抗聯官兵之「中國朝鮮族」、「中共黨員」身份，開始將他們稱為「朝鮮共產主義者」，而中國軍事博物館甚至取消了朝鮮義勇軍歷史的展出，原因是朝鮮不承認這段歷史^㉑。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時任領導人在東北抗聯的領袖地位與貢獻則得到了濃墨重彩的書寫。9月18日，劉少奇訪朝期間在平壤群眾大會的講話中甚至高度肯定金日成領導了「十五年」抗戰，稱「朝鮮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所進行的革命鬥爭，在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史上，佔有重要位置。金日成同志領導抗日游擊隊，在沒有大後方，沒有正規軍支援的情況下，同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英勇戰鬥了十五年」^㉒。

雖然1965年後中朝關係出現退潮，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史的關注熱情也大幅降低，但這一時期的很多指示對後續相關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到1980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原東北抗聯幹部韓光明確要求東北抗聯史編寫組遵循周恩來的指示，「體現出我們尊重朝鮮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祖國獨立的鬥爭的歷史事實」^㉓。事實上，朝鮮的歷史書寫並不接受「共同領導」的表述，不承認中共對東北抗戰的領導，而是強調金日成部隊的獨立性。1990年代初，到訪中國的朝鮮中央黨史研究者甚至抱怨，「中國的黨史著作是按中國的情況寫自己的黨史，我們則是按自己的情況寫自己的黨史。這裏主要問題是在於中國同志在寫黨史中把朝鮮同志也包括進去了」，「我們的意思不是要強調誰領導了東北抗日鬥爭，主要是強調偉大領袖的獨立領導和創造性……主要是承認朝鮮人民革命軍的獨立性」^㉔。

四 第四階段（1980至1990年代）：丹東會議與首次編史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間，如同當時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東北抗聯史的研究被迫中斷。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為了「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高度重視黨史資料的徵集與研究工作，遂組建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徵委）^㉕。這是東北抗聯史研究勃興的基本背景；而推動編史工作的直接因素，則是朝鮮關於東北抗聯史的書寫引起中共中央的關注。1980年7月底，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就編寫東北抗聯史問題給中徵委主任馮文彬的信中指出，「朝鮮已出版有關東北抗聯方面的著作，對歷史有所歪曲，過份誇大了朝鮮同志的作用，因此，我們有必要按歷史本來的面目，盡快地寫出一本東北抗日聯軍史來，同時，對朝鮮同志的貢獻和作用，實事

求是地給予充分的肯定」。8月3日，黨史研究室主任胡喬木批示了這封信，同意編寫東北抗聯史，但要求不要宣傳或發任何信息，在出版之前不事聲張，不許有任何偏向、辯論、討論，要反覆核實，不要爭時間^④。

8月5日，黨史研究室召集東北三省黨史工作者，座談編寫《東北抗日聯軍史》的問題。會後提交馮文彬並上報胡耀邦和胡喬木的〈總結〉指出，與會者認為「編寫《抗聯史》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是中國人民抵抗日帝國主義英勇鬥爭的光輝一頁，不僅東北，而且在中國革命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抗日聯軍的鬥爭凝聚着中、朝兩國同志的鮮血，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準確地記述抗日聯軍的這些史實和歷史功績，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總結〉還提議為推動編寫工作的順利展開，成立由東北三省省委領導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批准編寫計劃，組織隊伍，研究重大疑難問題，審定書稿」^⑤。

胡喬木、胡耀邦很快親自批示同意，並指示由東北三省省委書記（吉林省委書記于林、遼寧省委書記李荒、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劍白）組成東北抗聯史編寫領導小組。1982年8月23日，中徽委委託韓光擔任這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考慮當時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歷史問題並未作出結論，韓光專門確立了一系列原則，包括：第一，東北抗聯鬥爭「是我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武裝抗日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東北抗日聯軍的革命紅旗是始終不倒的，是堅持到最後勝利的」；第二，東北抗聯後期鬥爭史相當重要，退入蘇聯整訓是「必要的戰略性轉移」；第三，東北抗聯與蘇聯遠東軍是「互相支援、共同對敵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關係」，「是為着共同對敵的大目標，符合中蘇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等等^⑥。

鑒於東北抗聯史的敏感性與複雜性，韓光還提出內外有別的原則，即分別編寫在內部發行的「專題資料」與公開出版的史書。公開出版的史書要「具有教育意義」和「科學價值」，着重反映中共領導東北人民艱苦卓絕、英勇鬥爭的歷史，讚頌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反動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內部發行的「專題資料」則主要記錄「公開出版的抗聯鬥爭史中不宜寫、不宜展開的重大歷史爭議問題」、某些特殊事件（如「民生團」事件^⑦），以及「某些涉及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問題，涉及對蘇關係問題」等^⑧。他強調，「對於中、朝同志並肩作戰的光榮歷史，對於同聯共、蘇聯遠東軍的關係，都要遵循中央的精神，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審慎地處理得當」^⑨，並規定了三類不宜公布的史料：不利於黨內團結和同志間團結的重大爭議、影響民族團結或涉外關係的言論、黨和國家從未發表過的機密^⑩。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動下，到1980年代中期，東北抗聯史的資料整理與史書編寫工作取得一系列進展，但東北抗聯史長期存在的一些爭議問題持續發酵，嚴重干擾了編史工作。為解決這些歷史爭論，1985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馮文彬、韓光在遼寧丹東市主持召開「東北抗聯歷史問題座談會」（史稱「丹東會議」），邀請近二十位原東北抗聯具有代表性的老同志參加。這次會議對東北抗聯歷史進行了全面回顧與分析，就東北抗聯歷史評價、早期爭議問題等達成共識，形成〈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紀要〉報送中央。1986年4月24日，中央批覆同意〈紀要〉，並以正式文件（中委〔1986〕102號）的形式發送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和全國省軍級以上單位。該文件的形成標誌着中共中央

首次就東北抗聯早期歷史問題作出結論，「關於東北抗聯歷史問題的爭論已經得出正式結論而宣告終止」^⑤。

丹東會議的召開對1980年代以降的東北抗聯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從積極一面來說，這次會議形成的結論暫時平息了圍繞東北抗聯史長期存在的一些爭議問題，推動了史料編纂與編史工作的展開。中共中央專門指示，對東北抗聯史原則性問題的理解和表述，「均應遵循中央文件的精神，與之保持一致而不應另作異議或另生枝節」^⑥。此後，一批重要的史料叢書與史著相繼問世，最重要的是中央檔案館與東北三省檔案館聯合編纂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⑦。這批原始檔案以及在此基礎上撰寫的東北抗聯史著、各類日記、人物傳記等，初步釐清了東北抗聯史的基本脈絡^⑧。從消極一面來說，1986年中央文件也為東北抗聯史研究的深入推進劃定界線，其中「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裝」、東北抗聯退入蘇聯整訓是「戰略轉移」，與蘇聯遠東軍是「協作」關係等結論，都成為東北抗聯史研究延續至今的基本論調^⑨。

在上述背景下，《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於1986年底完成初稿，前後歷時六年，1987年底修改定稿後提交黨史研究室審訂。審訂過程中，黨史研究室最關切的是書中涉及朝鮮和金日成的內容，多次徵求當時負責對朝關係問題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聯部）的意見。1988年12月，中聯部經過綜合、慎重考慮，正式通告黨史研究室，「從當前國際形勢和中朝關係的發展趨勢看，該書可以公開出版」。1989年8月15日至17日，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等中央領導人分別批示同意出版^⑩。1991年，《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正式交人民出版社付梓，這是建國以來第一部系統、完整呈現東北抗聯鬥爭史的專著。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初期，參與東北抗聯史編寫的東北黨史工作者常好禮、高樹橋、趙俊清等人，充分利用掌握的史料，撰寫了一批頗有特色的專題著作或傳記等^⑪。

這一時期的東北抗聯史研究具有「資料徵集、整理、考證同步進行」的基本特徵^⑫，對其後研究的推進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第一，首次系統公布了數量極為可觀的原始檔案，為當時及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彙編史料約1,500萬字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時至今日都是東北抗聯史研究者必備的案頭書；第二，出版了第一部系統、完整呈現東北抗聯鬥爭史的研究專著；第三，中共中央第一次就東北抗聯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暫時平息了東北抗聯史領域長期存在的一些歷史爭論；第四，這一時期的研究隊伍與推進力度是空前的，研究由中共中央與東北三省省委領導直接主持，以體制內黨史工作者為主，離退休人員與在世的原東北抗聯老戰士積極參與，此後再無此「盛況」；第五，迄今為止，東北抗聯史研究仍未在1980年代達到的水平上取得真正突破。

五 第五階段（2015年以來）：「十四年抗戰」與新熱潮

東北抗聯史研究的新一輪熱潮始於2015年前後，一個重要契機是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2014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九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式提出

「十四年抗戰」的概念，指出「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並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⑤9}。一年後，他指示「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8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14年抗戰的歷史，14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⑥0}。如果以「九一八事變」作為抗日戰爭的起點，那麼中共領導抗戰集中體現在中國東北，以東北抗聯的歷史為主要彰顯。因此，中共中央「十四年抗戰」的指示掀起了東北抗聯史研究的新一輪熱潮。有關東北抗聯史研究的各類科研項目的立項數量與資金投入都大幅提升，高校、黨史部門、科研機構以及民間的史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紛紛開始關注東北抗聯歷史，推出各類論著^{⑥1}。

整體來看，相對於1980年代，延續至今的這一輪研究熱潮並未帶來實質性突破：第一，史料的搜集整理主要是在1980年代完成的基礎上進行，新發掘的史料數量極少，且不成體系；第二，很多研究是國家宣傳的產物，無論從研究方法、史料運用還是基本結論，都難以稱之為嚴謹的史學研究。著名黨史專家李海文指出，受經濟利益衝擊，「有些研究者浮躁、急功近利。現在公布的資料浩如煙海，很少有人有精力、有興趣、踏實、認真、全部閱讀」^{⑥2}。相對黨研機構的工作者，學術研究者首先在資料獲取方面就面臨重重困難，大量罔顧歷史真實的所謂東北抗聯研究史著紛紛面世，造成了從官方機構到民間社會對於這支部隊歷史認知的混亂。不過，這一時期比較積極的態勢是，一些研究者開始將關注視角轉向更為細分的領域，並且取得了一系列比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如對東北抗聯根據地建設、部隊後勤保障、物資貿易等問題的探討^{⑥3}。

令人欣慰的是，由於東北抗聯後期鬥爭的「國際性」，特別是以金日成為首的東北抗聯朝鮮幹部成為戰後朝鮮國家領導集體的事實，相關問題已經引起冷戰國際史、中朝關係史等領域專家學者的關注。他們熟練運用多國檔案資料，以嚴謹的史料考證，推動東北抗聯史研究呈現出全新的面貌。冷戰史專家沈志華在〈試論八十八旅與中蘇朝三角關係〉一文中就運用多國檔案，梳理了東北抗聯教導旅從組建、發展到最終解散的歷史過程，考察了期間中、蘇、朝三國共產黨人互動關係的形成及其特徵，以及二戰後期遠東地區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及中、蘇、朝之間微妙的三角關係。他指出，中、蘇、朝三國共產黨人在抗日問題上有着一致利益，而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短暫歷史構成了戰後中共與朝鮮戰略關係的基礎，並為冷戰期間朝鮮黨內鬥爭、中朝關係演變，以及中、蘇、朝三角關係的變遷埋下伏筆^{⑥4}。

雖然沈志華表示他的研究文章只是「初探」，稱「真正深入的研究還有待於基本文獻資料的開放和發掘」^{⑥5}。然而，這一「初探」首次將「國際史」與「多國檔案互證」等一些冷戰史領域的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引入東北抗聯史研究，為長期由黨研機構主導、「整齊劃一」的東北抗聯史研究注入新的生機，也為那些真正希望還原這段歷史的史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沈志華的研究同時也提醒相關研究者，東北抗聯後期鬥爭史不僅是中共歷史的一個階段，也關乎二戰遠東反法西斯聯盟的問題與戰後中、蘇、朝三角關係的形成，乃至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緣起。如果不對這一歷史作充分、透徹的探討，關於戰後中朝、中蘇、蘇朝關係與中、蘇、朝三角關係的變遷，以及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

2018年，俄羅斯著名史學雜誌《歷史》刊登了越南峴港維新大學(Duy Tan University)客座教授卡特舍夫采娃(E. B. Катъшевцева)與韓國大學教授閔庚賢

合作完成的〈金日成與第八十八步兵旅的政治軍事訓練(1942-1945)〉一文。這篇文章使用了來自俄羅斯國防部一批最新解密的檔案，細緻地梳理了金日成在東北抗聯教導旅時期培植與經營個人勢力、確立自己在東北抗聯朝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的過程，揭示了這段「蘇聯經歷」對這位日後朝鮮最高領導人成長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政治家產生的重要影響，認為「遠東方面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經歷對金日成的成長扮演了重要角色」⁶⁶。

這篇文章同時指出，東北抗聯教導旅時期金日成個人及其在蘇聯軍事系統中的地位「都沒有任何特殊性」，他「只是一名優秀的教官」。為此，兩位作者查閱了超過400頁的東北抗聯教導旅絕密檔案，發現金日成的名字只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1943年冬政治訓練的總結與5月任務的討論報告，第二次是1943年1月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的聽眾名單，第三次是1944年1月遠東軍政治部檢查馬列學習的優秀者名單。在這三份文件中，金日成的名字甚至被拼寫錯了兩次。文章指出，出現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在於，無論莫斯科還是遠東軍，當時對朝鮮事務均沒有興趣⁶⁷。

上述兩篇文章應當代表了當前東北抗聯教導旅歷史研究的最新進展，這些研究的價值不僅在於披露出新的史料，還在於為東北抗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觀察與分析視角。

六 結語

本文主要梳理了東北抗聯史研究的五個階段及其特徵。整體來看，有關東北抗聯史研究的緣起、發展和勃興，都與中共中央的關注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結論、相關行政部門對史料的壟斷，以及統一意識形態指導下歷史敘事的「整齊劃一」等，都極大影響到相關研究的深入。而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獨特性及其至今仍相對敏感的現實，進一步加劇了相關研究的亂象，使歷史的真實仍遙不可及。梁啟超曾說：「我們若信仰一主義，用任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唯無益，而又害之。」⁶⁸當前那些層出不窮的有悖歷史真實的黨史作品，不僅使人們對東北抗聯史的認知變得混淆不清，也在反向蠶食人們對這段歷史所承載與展現的中共及其傑出代表優秀品質的信仰。

恩格斯曾經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⁶⁹。無論是東北抗聯一度脫離中共領導、接受聯共(布)黨領導的歷史，還是這支部隊本身展現出的中、蘇、朝三國共產黨人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客觀事實，對於理解戰後中朝、中蘇、蘇朝關係以及中、蘇、朝三角關係的緣起及變遷，均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而無論是貫徹中共中央「十四年抗戰」的指示，還是闡述抗戰期間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其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甚或提煉所謂「抗聯精神」，首要工作都應該是以「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歷史資料」，還原歷史的真實，讓學術真正回歸學術。

註釋

- ① 〈關於解散遠東第二方面軍第八十八特別步兵旅的情況說明〉(1946年2月22日)·ЦАМО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 ф.2, оп.12378, д.1, л.68-69。
- ②③ 李海文:〈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的過去與現狀〉,《北京黨史》,2010年第4期,頁10。
- ③ 現有東北抗聯史研究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從中國革命史的視角,主要以中共領導東北抗戰史作為敘事主線。最具代表性的是目前最權威的兩本東北抗聯史著作:《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第二類,從國際史的視角,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遠東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及中、蘇、朝之間的相互關係。代表性成果參見沈志華:〈試論八十八旅與中蘇朝三角關係——抗日戰爭期間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4-16;郝江東:〈遠東戰役視角下東北抗聯教導旅初探〉,《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9期,頁80-89;第三類,關注東北抗聯朝鮮官兵群體的研究,特別是金日成作為核心的朝鮮領導集體的形,參見金成鎬:〈論東北抗聯教導旅朝鮮民族群體及其歷史地位〉,《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頁43-51;E. В. Катышевцева and Мин Кён-Хён,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чёба в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и Ким Ир Сен (1942-1945 гг.)”, *ИСТОРИЯ*, no. 9 (2018): 101-22;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409。
- ⑤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1946年1月16日),載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44。
- ⑥⑩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359-60;387-88。
- ⑦ 〈堅持十四年東北抗戰領袖〉,《新華日報》,1946年3月14日,第2版。
- ⑧ 〈中共中央關於拒絕交出我軍戰鬥序列的理由給葉劍英等的指示〉(1946年2月2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129-30。
- ⑨ 這一時期中共主流報章《解放日報》、《東北日報》、《新華日報》以及新華社連續刊登或播發了東北抗聯歷史的內容,如〈周保中將軍答本報記者問 闡述抗日聯軍鬥爭簡史及對東北建設意見〉,《東北日報》,1946年2月22日,第1版;〈中共領導抗日聯軍在東北苦鬥十四年〉,《解放日報》,1946年3月11日,第1版;〈艱苦卓絕十四年 周保中將軍縱談東北抗戰歷史與現勢〉,《解放日報》,1946年3月12日,第1版。
- ⑩ 郝江東:〈二戰後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恢復關係始末〉,《邊疆與周邊問題研究》,2019年第2期,頁86-103。
- ⑪ 陳正人筆記,1947年11月,未刊稿;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畢業生座談會紀要,1981年12月23日,未刊稿。
- ⑫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前東北地下黨組織之黨員與抗聯幹部的決定〉(1948年1月1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瀋陽:白山出版社,2011),頁984-85。
- 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500。
- ⑭ 《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頁497。
- ⑮⑯⑰⑱ 「說明」,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東北抗日聯軍歷史資料》(內部發行,1955),無頁碼。
- ⑲ 到1930年夏,朝鮮共產黨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活動已基本歸入中共直接領導。朝共黨員加入中共後,中國東北的中共黨員中,朝鮮籍佔了一半的份額。沈志華指出,「1930年代初中共東北地區的縣委書記和區委書記差不多都是朝鮮人擔任」。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25。

- ②②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中共東北地方黨史資料·訪問錄選編(周保中同志專輯)》，1980年11月，未刊稿，頁13；101-103。
- ②③ 〈周保中張壽錢給崔石泉並轉黨委諸同志的信：關於編組A野營的抗日聯軍為蘇軍制式〉(內部資料，1942年7月23日)。
- ②④ 如金一(即朴德山，1948年當選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此後歷任內閣副首相、國家副主席等)、朴成哲(歷任外交部副部長、部長、內閣副首相、國家副主席等)、李永鎬(最高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崔賢(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崔勇進(內閣副總理)、吳振宇(國防部長)、韓益洙(人民軍總政治局長)、徐哲(勞動黨檢閱委員會委員長)、金京石(勞動黨平壤市委員長)等。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上冊，頁51。
- ②⑤ 東北朝鮮幹部問題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焦點是龍井「高幹班」問題。1947年，吉林省委在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設立培養區、營以上幹部的高幹班，召集了原東北抗聯、朝鮮義勇軍朝鮮官兵與吉林朝鮮人解放同盟、民主大同盟等地方幹部。參加高幹班的超過85%的幹部最終被開除黨籍。金日成聽聞此事後，將被東北局開除黨籍的朝鮮幹部召到朝鮮任職，其後，延邊地委副書記、常委林春秋便帶領他們前往北朝鮮(參見延邊州黨史所訪問張恩姬記錄，1981年3月11日，未刊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複查歷史老案的指示。延邊州委組織部自1982年下半年開始複查「高幹班」問題，並形成報告提交吉林省委組織部。報告指出，在當時條件下對朝鮮幹部作嚴格審查是必要的，「高幹班問題不能當作一個集團性案件對待，只能按照有錯必糾的方針，錯甚麼糾正甚麼」(參見姚作起主編：《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4]，頁82-85；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畢業生座談會紀要)。
- ②⑥ 〈我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居留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利回去保衛祖國 中國人民既不接受也不畏懼美帝的指責 將永遠站在朝鮮人民方面反對美國侵略〉，《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第1版。
- ②⑦②⑧ 超祺、林洪：〈中朝人民的革命友情——記朝鮮同志在東北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迹〉，《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3日，第2版。
- ②⑨ 陳明：〈中國東北境內的朝鮮民族〉，《人民日報》，1950年12月6日，第3版。
- ③⑩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上冊，頁485。
- ③⑪ 1960年，朝鮮當局為了塑造金日成領導抗日游擊運動的歷史，以及塑造其子金正日的繼位合法性，提出將天池與長白山劃入朝鮮。對此，中國政府作出重大讓步，同意將天池與長白山作為兩國分界線。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上冊，頁543-44。
- ③⑫ 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十二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3)，頁53-57。
- ③⑬ 〈平壤隆重舉行群眾大會和工農赤衛隊檢閱儀式 紀念朝鮮抗日游擊隊創建三十周年 金日成同志與其他朝鮮領導人和我人大代表出席 崔庸健委員長和彭真團長講話論述朝鮮抗日武裝鬥爭的重大歷史意義〉，《人民日報》，1962年4月26日，第1版。
- ③⑭ 〈周恩來與崔庸健的會談〉(內部資料，1963年)。
- ③⑮③⑯ 〈李范五同志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內部資料，1963年)。
- ③⑰ 〈延邊地區貫徹周總理朝中關係指示的討論〉(內部資料，1963年)。
- ③⑱ 〈陳雷同志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內部資料，1963年)。
- ③⑲ 〈周總理關於朝中關係問題的指示〉(內部資料，1963年)。
- ④⑰ 〈劉少奇主席在平壤各界歡迎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3年9月19日，第1版。
- ④⑱④⑲ 〈注意研究東北抗聯歷史問題〉(1984年8月31日)，載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吉林省東北抗日聯軍研究基金會編：《韓光黨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5；64；60。
- ④⑳ 〈朝鮮中央黨史研究所對東北抗日戰爭史的看法〉(內部資料，1993年6月)。
- ④㉑ 〈把工作重點轉到重點徵集和專題研究上來〉(1983年8月26日)，載《韓光黨史工作文集》，頁42。
- ④㉒ 〈廖蓋隆的信〉(內部資料，1980年)。

- ④⑤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信〉(內部資料, 1980年)。
- ④⑥ 〈東北抗日聯軍始終堅持戰鬥在抗日疆場〉(1984年5月8日), 載《韓光黨史工作文集》, 頁53-54。
- ④⑦ 「民生團」事件是指1933至1934年間, 中共滿洲省委為了清除反革命和日本奸細, 在東滿地區的黨、軍、群眾組織內進行的肅反鬥爭。這次鬥爭致使兩千多名朝鮮同志被錯誤處死, 真正的「民生團」奸細沒有幾個。
- ④⑩ 〈黨史工作意義重大 主動服務義不容辭〉(1982年8月23日), 載《韓光黨史工作文集》, 頁16。
- ④⑪⑫ 〈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紀要〉與韓光的信(內部資料, 1990年)。
- ④⑬ 中央檔案館、東北三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內部發行, 1988-1993)。
- ④⑭ 比如潘喜廷等:《東北抗日義勇軍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5); 譚譯主編:《東北抗日義勇軍人物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 陸毅、王景主編:《中國共產黨東北地方組織的活動概述:1919.5-1945.10》(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劉文新、李毓卿:《周保中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劉楓:《李兆麟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9); 趙亮、紀松:《馮仲雲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4)等。
- ④⑮ 1990年, 黑龍江省委將1986年中央文件發至全省縣級單位, 並同時發給吉林和遼寧, 要求公開在報刊發表的東北抗聯史文章特別是文藝作品, 都應與這份文件的精神保持一致, 「都需要通過省宣傳部門審核」。參見〈毛祚策的信〉(內部資料, 1990年)。
- ④⑯ 史義軍:〈《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第一版出版內情〉, 《黨史博覽》, 2012年第8期, 頁26-27。
- ④⑰ 比如常好禮:《東北抗聯路軍發展史略》(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3); 高樹橋:《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史》(瀋陽:白山出版社, 1993); 趙俊清:《趙尚志傳》、《楊靖宇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④⑱ 常好禮、王正清:〈抗聯史料與抗聯研究〉, 《世紀橋》, 1996年第3期, 頁46-47。
- ④⑲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 2014年9月4日, 第2版。
- ④⑳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 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 《人民日報》, 2015年8月1日, 第1版。
- ㉑ 「中國知網」數據庫收錄的自1960至2020年4月發表的各類論文, 篇名中出現「抗聯」一詞的共計956篇, 其中發表於2015年以來的就有526篇。
- ㉒ 如閻弘宇:〈淺析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特殊形式的根據地〉, 《軍事歷史研究》, 2004年第4期, 頁64-66; 劉信君、李紅娟:〈東北抗日聯軍後勤保障工作的實踐與啟示〉,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6期, 頁112-16; 李志銘、張林祥:〈東北抗日聯軍的物資貿易及其啟示〉, 《長白學刊》, 2018年第3期, 頁108-14。
- ④⑳ 沈志華:〈試論八十八旅與中蘇朝三角關係〉, 頁4-16; 5。
- ④㉑ E. B. Катывшевцева and Мин Кён-Хён,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чёба в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и Ким Ир Сен (1942-1945 гг.)", 101-22.
- ④㉒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載沈鵬主編:《梁啟超全集》, 第八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頁4800-4801。
- ④㉓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頁9。